

# 《安定县乡土志》的文本特征与史料价值

## ——基于清末新政背景下的探析

魏士煜

**提 要：**乡土志具有中国传统方志的风格，又兼有晚清时代特征。究其产生之由，既是外来乡土教育潮流冲击而致，亦是晚清政府顺势而为统御民众思想意识使然。《安定县乡土志》作为甘肃地方为数不多的乡土志之一，保存了编写乡土志旨趣的序言、凡例信息，具有代表性。《安定县乡土志》是基于晚清乡土教育施行的现实需要而出现的，教育属性是它的首要属性，它兼有例目灵活多样、内容考证翔实、表达简略有趣的文本特征亦是出于教育功用目的而附生的。该志也保存了安定地方教育、商业、地理、军事四个方面的史料，对研究安定地方乃至甘肃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清末新政 癸卯学制 《乡土志例目》 《安定县乡土志》

乡土志<sup>①</sup>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一种特殊方志，它的产生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是有密切关联的，所涉最为紧要者当属该时期的教育。乡土志是在中国首部学制“壬寅学制”与实际颁行的“癸卯学制”制订之后出现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其影响，至今仍续。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乡土志汇集方志和乡土教材于一体，从而有了存史功能和教化属性，这对于研究清末民国的地方社会和国家教育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

学界关于乡土志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大体可归为以下3种研究类型：一是从整体上对乡土志的研究，如崔建英厘清了传统“乡土志”与近代“乡土志”的区别，侯春燕从晚清乡土志的产生原因和特征出发，述及了当代修志的问题与解决思路，王兴亮着重探讨了清末民初乡土志书与乡土教育的关系；<sup>②</sup>二是聚焦到地方，对地方乡土志的通体研究或是专注于某一乡土志的个案研究，如刘超建对清末新疆乡土志的探讨，王雪玲对陕西乡土志的研讨，朱玉麒对《疏附乡土志》散佚的辑究；<sup>③</sup>三是利用乡土志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如赵心愚依据宣统《盐井乡土志》对西藏么些人的述论，陈晓根据山东乡土志对明初移民的论证，崔广庆运用新疆多种乡土志对新疆文庙的探究。<sup>④</sup>观及上述，学界对乡土志的研究不管是整体把握还是个案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具体到甘肃则显得很是薄弱。目前为止，对《安定县乡土志》的研究，主要

① 关于乡土志的来源有争议，笔者认同乡土志是源于清末学制改革的乡土教材的需要。

② 参见崔建英：《识乡土志》，《图书情报工作》1986年第6期；侯春燕：《关于晚清乡土志编纂的思考——兼谈当代修志的问题与出路》，《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6期；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2期。

③ 参见刘超建：《清末新疆乡土志及其史料价值》，《历史档案》2015年第3期；刘超建、冉超：《新疆乡土志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史料价值研究》，《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10期；王雪玲：《陕西乡土志及其史料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朱玉麒：《〈疏附乡土志〉辑佚初稿》，《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④ 参见赵心愚：《宣统〈盐井乡土志〉关于西藏么些人的记载》，《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陈晓：《山东乡土志所见明初移民——兼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崔广庆：《清代新疆地方志所载文庙汇考》，《新疆地方志》2020年第4期。

集中于运用,如负有强运用西北乡土志(包括安定)对西北商贸流通的探析<sup>①</sup>,缺乏专门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欲以晚清教育变革的视角下来考察该志,从编纂背景、文本特征、史料价值三个方面来探讨它的形成及其意义,以请教于方家。

## 一 《安定县乡土志》的编纂背景

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救亡图存”逐渐成为时代主题。如若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战败和条约签订没有完全使统治阶层深刻意识到所处的局面,那么《辛丑条约》的签订则直接促成清廷高层接受“变法”,而在诸多的“变法”主张中,教育改革尤其突出。在中西碰撞中,“西学东渐”带来的教育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起到先行催化的作用,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纲要的提出,则满足了时局发出的诉求,从而使西方教育理念的引进有了充足的承置空间。张百熙在给光绪帝的呈折中就说:“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第考其现行制度,亦颇与我中国古昔盛时良法,大概相同。”<sup>②</sup>从本土上溯历史規制,使得“西法”有了历史之由,而施行“西法”的现实依据之一就是本存的学校已经“名存而已”,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无法满足时局需要。“故今日而议振兴教育,必以真能复学校之旧为第一要图。虽中外政教风气原本不同,然其秩序条目之至曠而不可乱者,固不必尽泥其迹,亦不能不兼取其长,以期变通而尽利。”<sup>③</sup>为施行新的学制找到了合理的施行依据。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发轫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法令颁布并在全国通行的近代学制,从形式上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奏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制定了我国近代初等教育的学制、教育宗旨、课程设置、各学科的教育要义及教学进度。根据学制的规定,乡土志应运而生。但“海内甚广,守令至多,言人人殊,虑或庞杂”<sup>④</sup>,因此之故,黄绍箕<sup>⑤</sup>则“查《初等小学堂章程》历史、舆地、格致三科均就乡土编课,用意至为精善,谨遵照定章编成例目,拟恳奏请飭下各省督抚,发交各府、厅、州、县,择士绅中,博学能文者,按目考查,依例采录。自奉文日始限一年成书”<sup>⑥</sup>。为了适应全国统一乡土志编写的需要,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黄绍箕编订的《乡土志例目》经学务大臣上报,正式由光绪帝下旨颁发。当年十二月,《安定县乡土志》初稿完成。

《安定县乡土志》的生成既有社会背景的影响,同样也离不开著者的个人教育背景。王黼堂,字幼陶,又字又陶,生于同治七年(1868)。他跟随其父王作枢和伯祖父王希会接受了严格的正统教育。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取拔贡,选授直隶州州判,分陕西任用,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在各省设立省级谘议局,王黼堂被选举为甘肃省谘议局副议长。宣统元年十二月拟撰议复陕甘制军长少帅《甘肃谘议局问题六款》。民国

① 参见负有强:《清末民国时期西北丝路沿线乡土志中有关商贸流通的编纂实践探析》,《史志学刊》2020年第2期。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5册,第4902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4902—4903页。

④ 田雨:《清学部颁〈乡土志例目〉》,《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⑤ 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号漫庵,浙江瑞安人。在政治上,黄绍箕主张变革维新,历任会馆编纂修提调、京师大学堂总办、编书局译学馆监督、湖北提学使等职。

⑥ 《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例目拟通飭编辑片》,《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

成立后，以逸民自居，隐居不出。安定名士康屏侯曾作挽联云：“生长在太史词臣之家，童年对客挥毫，诗句惊人，学问渊博，文章选拔，附康讲新经，变法参加保皇党；归来于满清逊政而后，垂老闭门读易，田园食己，衣冠不改，子嗣借承，慕陶守旧业，危言非笑主人翁。”全联对他的一生作了全面概括总结。<sup>①</sup>

如上所述，王黼堂深受中国传统学问的陶染，是一位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同时他又立足于新时代，接受了维新主张，自然也就成为了维新派的拥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暗合王黼堂的新旧学识素养以及其“忠君爱国”的思想追求，这使得他积极投身其中。此外，地方志书是一种具有重要文化传承用途的公共文化产品，对于受传统教育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来说，修撰地方志书既是一件功德，同时也是使命所在。在此背景之下，《安定县乡土志》被修撰完成。

## 二 《安定县乡土志》的文本特征

《安定县乡土志》既严守《乡土志例目》的规格，又在限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记载丰富的内容，诚如作者所言：“然天下无论何事，能择其有关于民族、有关于社会、有关于国家者，表而出之，亦未始无益于世运。”<sup>②</sup>正是基于此，作者统筹“传统”与“新式”，揉合二者之长，书写出了新式乡土志。其文本特征具体体现在例目灵活多样、内容考证翔实、表达简略有三个有趣方面。

### （一）例目完备灵活

《安定县乡土志·序》中写到：“今天子百度维新，专心政教，搜海内乡土各志，订科学之课程，望治之情普天同切，大同之化日渐开明。异日者五洲一堂，括古今中外之五光十色，一台而舞，一炉而冶，其端定肇于此矣。顷者大府印发例目，催办乡志。”<sup>③</sup>该志凡例中又写到：“是篇依原来例目之先后为序，不敢妄有错综，以符奏定章程之規制。”<sup>④</sup>由此得知，《安定县乡土志》确是据《乡土志例目》的要求修撰的。除了例目的吻合外，《乡土志例目》也明确说明：“乡土志不列凡例者，以有部颁例目。先后次第，既有准绳，其他升降弃取，皆有一定之法”，“所谓以前人之事实，为后学之感劝者是已。苟稍有差池，即与例目齟齬”<sup>⑤</sup>，足见其要求之明确严格。

我们若仔细查看《安定县乡土志》与《乡土志例目》二者条目，便会发现二者条目之间大部分虽然完全一致，但具体分化到各个条目之中也有很明显的差异。《乡土志例目》共15门，分别是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这15个门类在《安定县乡土志》中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我们可将两者条目进行详细对比：

① 张镛：《陇上才子王黼堂》，《定西日报》2018年12月29日，第5版。

②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序》，“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第6册，第598页。

③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序》，“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598页。

④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序》，“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01页。

⑤ 赵庚奇：《修志文献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66页。

《乡土志例目》与《安定县乡土志》条目对比表

《乡土志例目》	《安定县乡土志》	《乡土志例目》	《安定县乡土志》
历史 政绩录 兵事录	历史 政绩录 兵事录	实 业	实 业
耆旧录	耆旧录	地 理	地 理
人类	人类	山 水 道 路	山 水 道 路 险 隘
户口	户口	物 产	物 产
氏族	氏族	动 物 制 造	动 物 制 造
宗教	宗教	植 物 制 造	植 物 制 造
		矿 物 制 造	矿 物 制 造
		商 务	商 务

如表所示，二者条目在15个大门类上一致，只不过《安定县乡土志》多了一个险隘门类，这显然是对旧志的继承。除此之外，二者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地理门类上，《乡土志条目》的地理门类有古迹、祠庙、坊表、柜梁、市镇、学堂6个小分支，而《安定县乡土志》的地理门类有里分、铺递、堡寨、坛庙寺观、坊表、学堂、桥梁、古迹8个小分支，其中坊表、学堂、古迹3个是共有的，剩余的里分、铺递、堡寨则具有地方特色，这是对规定条目的突破与创新，体现了灵活性。

作者王黼堂深受传统学术体系的熏染，自然习惯于以往旧志的体例编排，修订新体例的乡土志，需要重新调整原有的惯有思路。《安定县乡土志》不分卷，正文按照16个大类展开，基本上囊括了旧志具有的内容，不过与明清旧志相比，又多了“人类”“实业”“商务”3个新门类，

这是对旧志的突破。另外，作者依据写作需要，对内容进行了灵活调整，并不完全拘泥于《乡土志例目》。如在政绩录部分，作者写道：“按原来例目，以名宦归耆旧类，似未尽合，兹摘名宦归政绩类，名实乃相符矣。”<sup>①</sup>再如实业部分虽按士农工商四部分述写，却又据实说：“究之此辈皆农业家分利之游民，谓为实业太不伦类，姑志其数，以佐有心世道者之考镜。”<sup>②</sup>

## （二）内容考证翔实

按《重修定西县志》序所说，定西县志自康熙十九年（1680）张尔介修撰《定西县志》后有二百余年没有再修。<sup>③</sup>《安定县乡土志·序》中也说：“今兹所录，多依康熙十九年旧志”，“至乾隆三十五年，而有百峦山人之钞本野志一卷，叙前事亟详细，予家祖传秘本”<sup>④</sup>。据上可知，有相当一部分历史时段是缺失的，虽然“钞本野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失，但仍旧是不够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作者根据新的修撰规定，对史实重新进行了调整和考证。如政绩录部分对“葫芦川”的考释，“案葫芦川因城北二水合流似葫芦形故名”；耆旧录中“谨案县志与家谱校对”，考证王廷瑶“系堂之太高祖也”<sup>⑤</sup>；地理部分，对“西市新城”的辨析，“案安西古城，旧名汝遮堡，则汝遮堡即今县北之安西川也，彼时尚未有城，西市新城即今甸川之古城也”，还有对“百峦山”的考究，认为“百峦山即北乱山，北八十里峦嶂绵密如蜂房，然明永乐中出龙马，土人莫氏献于朝，遂赐为牧地。案明宣德有义民王从义献马之事，其后嗣现居东乡，系伍冢里民籍”<sup>⑥</sup>。

再如坛庙寺观部分的考证，探明“西岩寺在西岩山颇幽寂壮丽，同治六年（1867）毁于兵火；毗卢寺在县西南三十里元至元中建，毁于兵火；幸岩寺在县南三十里，毁于兵火；镇海寺在甸子川毁于兵火”<sup>⑦</sup>。作者对记载简略不明处，做了扎实考究，既补充了旧志的缺失，也为后世留下了可靠的历史材料。

## （三）表达简略有趣

乡土志的推出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教育的需要，进一步言之，是出于对儿童的教育考虑；因此既要考虑到地方因素，也要顾及儿童的特点。《乡土志例目》规定：“奏定学堂章程所列初等小学堂学科，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讲乡土之植物、动物、矿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盖以幼稚之知识，邃求高深之理想，势必凿难入。惟乡土之事，为耳所习闻，目所常见，虽街谈巷论，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平时供儿童之嬉戏者，一经指点皆成学问”，又说“事必求其详核，文必期于简雅”<sup>⑧</sup>。统治者想要通过改革教育方式来达到教育目的，就要考虑到对受教育者的教育影响，而“对小学生而言，学习历史将过去和现在的事情联系起来是困难的，应该直观地学，必须通过对社区（家乡）的理解，从学生可见的、可知的、熟悉的、具体的地域场所、人物中，理出较为系统的学习内容和观念”<sup>⑨</sup>。

基于上述考虑，《安定县乡土志》的内容表达也具有“事详”“文简”的风格。如在政绩录

①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不分卷《政绩录》，“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04页。

②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不分卷《政绩录》，“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51页。

③ 参见郭汉儒：《重修定西县志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④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序》，“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598页。

⑤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序》，“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04—615页。

⑥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序》，“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62—663页。

⑦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不分卷《地理·坛庙寺观》，“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57页。

⑧ 田雨：《清学部颁〈乡土志例目〉》，《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⑨ 陈碧如：《乡土志探源》，《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4期。

部分写到“周像勤政爱民”，“杨松以才称”，“葛登府有修城功”<sup>①</sup>；植物部分，“胡豆俗名大豌豆即蚕豆”，“菠薐即赤根菜”，用简短的话将陈述对象描述出来，言简意赅。再如矿物部分，“白土俗名青土，能粉屋墙，其白胜于川粉；石膏俗名靡靡石，砌墙垣坚如石灰；红土俗名红胶泥，质点极细性极坚柔，可造陶器”；植物制造条目里有“青稞玉麦，可以煮酒醅，俗名甜醅”<sup>②</sup>。用通俗易懂的言辞记述地方物产，儿童容易感兴趣，便于接受学习的内容。而这样施行教育，可以使孩童熟悉乡土，热爱乡土，继而由乡土爱国家。因为乡土组成了国家，家国是一体的，由家乡扩展到家邦、家国，遂将乡土之情与爱国之情融为一体。<sup>③</sup>

### 三 《安定县乡土志》的史料价值

《安定县乡土志》虽“文简”，但记载的内容广泛且翔实，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补充了旧志所缺，增添了新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记载了旧志未载的战事资料

兵事录一类中详细记述了“癸未之屠”，并进行解说：“黼堂谨案百峦山人野志所载，安定三百年前人民颇饶，真血癸未之变，誓死报国，以故斗大山城屠戮殆尽，记名识姓者六千有奇，被创获全者十无一二，古今如此爱国之民不多得也，兹于忠义之中择其尤特别者录之，以表幽光，以资考镜。”<sup>④</sup>再如文载“丁亥之乱”，虽寥寥数语，事件经过却很清晰。这些记录为了解安定明末清初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材料，且能解释人口数量的变化。

#### （二）增添了旧志未载的里分资料

在康熙《安定县志》中里分有东正、定安、伍冢、龙尾、东青（县东）、潜后、坊郭、通西、西宁、合龙、得罗、甸子（县西）、正北、北平、平西、安西、好麦（县北）17所<sup>⑤</sup>，而在《安定县乡土志》中里分有东正、定安、伍冢、龙尾、东青（县东）、潜后、坊廓、通西、第八、麻子（县南）、西宁、合龙、得罗、甸子（县西）、正北、北平、平西、安西、好麦（县北）19所<sup>⑥</sup>。17所完全一致，但《安定县乡土志》中的里分比康熙《安定县志》中的里分多了第八和麻子（县南）两所。这对于该地的历史地理研究而言是很有益的。

#### （三）补充了教育变革的资料

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甘肃的教育变革也随之进行，但可惜的是关于该时段的教育资料不是太多，相对缺乏。对教育资料记载较早的《甘肃官报》《甘肃教育官报》分别是宣统二年（1910）、宣统元年才开始刊布的。因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成的《安定县乡土志》所载学堂部分的记载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原文载：“新设安定县高等小学堂，在南关文昌宫右，即育英书院旧址也，光绪三十一年设，现仅有普通教习一员，学生额数尚未定议，初等小学堂二处，一在南关崇福寺，一在北关真武庙，邑宰周公凤勋捐俸设立师范小学教习二名，现拟每人每年薪水银二十两，由县礼房届期领取，俟后筹有的款再议酌增薪水。”<sup>⑦</sup>据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该时期安

①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不分卷《政绩录》，“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06—607页。

②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不分卷《政绩录》，“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69—671页。

③ 参见陈丹平：《中华文化的乡土眷恋性与爱国主义传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

④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不分卷《兵事录》，“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41—642页。

⑤ 参见康熙《安定县志》卷2《建置·里分》，“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7册，第298—299页。

⑥ 参见光绪《安定县乡土志》不分卷《地理·里分》，“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54页。

⑦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不分卷《地理·学堂》，“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58—659页。

定县的新式教育开展状况，这为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 （四）新加了旧志没有的商业资料

该志文中载写：“大布商四大家山陕人业之，每岁统计境内出售大布一千一二百卷，各小商店零卖布匹，悉在此数，约值银三万四五千两之谱”，可知该时期商业主要是以山西和陕西商人为主，且其中的销售状况也被反映了出来。“杂货布店稍大者，城乡约五十家客民一半，本土人一半，就每岁各铺户收赈粮四五市石，每岁各家约共收粮二千余市石，约共值银二万四五千两之谱”。“杂货布店”“赈粮”的信息可以知晓此地经商本客之比例及“赈粮”的收取情况。“本地有入境之货，无出境之货，一切日用大而绸缎布匹，细而米酒灰盐果品木料以及各地器皿农具无不取给于外来，惟产粮为一大宗，所以生息人口者，以此所以抵制百货，亦以此因北二百余里，距省最近，省城土地多种烟苗，民间所食之粟，多从安定运往此，则吾邑之一大利源也”，说明该地的货物往来、运输情况和主产信息。此外，“安定每一市斗，计四十八筒，每斗粮约重一百斤”，为计量提供了明确信息。<sup>①</sup> 商务门类为经济史研究保留了关键信息，且为史学计量提供了可靠依据。

### 结 语

乡土志的出现是源于清末教育变革的需要，同时，也是“在西方国家的挑战、刺激、诱导和示范下启动的”<sup>②</sup>。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宗旨下，清政府首先要保证“中学”的根基与权威，其次才是“西学”的吸收和内化。因此，“强化乡土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其实便是强调‘中学’在现代教育知识体系中的应有价值和地位”<sup>③</sup>，这个过程既凸显了国家意志，也规范了乡土教材的编写。

王黼堂身处变革之际，积极参与这种自上而下的“移风易俗”之举。他认为“合个人可以成群治，合微物可以成市廛，合小邑可以成邦国”，又说“凡有民生皆关国计，一切风俗不外政教”<sup>④</sup>，足见他很重视地方的治理和教化。编写乡土志既迎合了来自上层统治者的要求，也是作者实现志趣的途径。在局势变换之际，清朝统治者需要通过类似王黼堂这样的知识分子来编写符合他们统治利益的志书。因此，《安定县乡土志》虽有突破旧志的特征，却也难以完全脱离旧志编纂的旨意。但处在新旧交接之时，应当注意到《安定县乡土志》的主要功用，即教育功能。《安定县乡土志》作为清末新政时期的一种变革产物，其文本具有例目灵活多样、内容考证翔实、表达简略有趣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出于教育功用目的而附生的，因而这些特征既能体现时代风格，也能反映变革过程，在整个乡土志的研究序列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安定县乡土志》在教育、商业等方面所保存的史料，对研究安定地方的社会面貌、教育情形、商业贸易等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甚至对研究晚清时段的甘肃面貌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参见光绪《安定县乡土志》不分卷《商务》，“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674页。

② 陈碧如：《乡土志探源》，《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4期。

③ 胡金平：《国家意志与我国乡土教育的三次勃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④ 光绪《安定县乡土志·序》，“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6册，第598页。